

中國教務會議百年：歷史與當下

相關報導與整理

編輯室

一百年前，即 1924 年 5 月 15 日，中國首屆天主教教務會議在上海的聖依納爵主教座堂開始舉行，其目的在於促進和陪伴中國本地教會的茁壯成長。百年後的今天，在羅馬召開一場國際會議，焦點集中在那次教務會議的經驗上，領悟其重要性和天主教會在中國歷程的現實意義。這場會議於 2024 年 5 月 21 日召開，主題為「中國教務會議百年：歷史與當下」，由聖座福音傳播部初傳福音和新建地方教會部門所屬的宗座傳信大學主辦。會議的發言者中包括上海教區沈斌主教、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Pietro Parolin）、聖座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塔格萊樞機（Luis Antonio Tagle），以及數位中國學者也在會上發表演講；宗座代表、宗座傳信大學校長博諾莫（Vincenzo Buonomo）教授在開幕式上致詞。教宗方濟各也透過視頻向與會者發表談話。本文根據梵蒂岡新聞網，整理教宗方濟各、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塔格萊樞機的發言，以此表達敬意與展望。

一、教宗：中國天主教徒為和平作出重大貢獻

教宗稱讚一百年前上海教務會議的神長們「感受到了眾議精神的經驗」，以及中國天主教徒「為和諧社會共處、建設共同

家園作出的貢獻」。以下是教宗方濟各視頻講話全文：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在上海中國教務會議百年紀念大會召開之際，我很高興能向你們發表講話。整整一百年前，即1924年5~6月在上海召開的首屆大會，也是迄今唯一的中國天主教教務會議。

這次大會的主題是「中國教務會議百年：歷史與當下」。誠然，出於多種原因，這百年紀念乃是一次寶貴的機遇。

1)天主教會在中國這個偉大國家的進程中，那次會議實在是一個重要的轉變。一百年前，神長們在上海的中國教務會議中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眾議精神的經驗，一起做出了重大決定。聖神使他們聚集一堂，在他們中增進了和諧，將大家帶上他們中許多人都從未想像過的道路，同時也克服了困惑和阻力。

神長們幾乎全都來自遙遠的國度。在教務會議召開前，對於考慮將教區的領導權交付給在中國出生的司鐸和主教這個問題，與會的許多人尚未做好準備。後來他們在教務會議中完成了真正的同道偕行之旅，簽署了所有開啓嶄新道路的決議，使天主教會在中國也能有一個日益中國人的面容。他們認識到這才是有待邁出的步伐，唯有使用他們的「母語」，基督教恩的宣講才能抵達每一個人類團體和每一個人。

教務會議的神長們跟隨如利瑪竇神父那樣的偉大傳教士們的足跡。他們在保祿宗徒開闢的道路上行走，這位宗徒

說，只要能宣講和見證復活的基督，「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格前九 22）。

2) 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恒毅 (Celso Costantini) 總主教，為促進和引領中國教務會議做出了重大貢獻。按照庇護十一世教宗的決定，他是這次會議的重要組織者和主席。

剛恒毅以真正傳教士的眼光看待具體情況，珍視本篤十五世教宗於 1919 年發表的關於傳教事務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 宗座牧函的訓導。遵從這道牧函的先知性精神，剛恒毅僅是再三強調，教會的使命是「傳福音，而非殖民」。在上海教務會議中，也得益於剛恒毅總主教的貢獻，聖座與在中國的教會之間的共融也結出了豐碩的果實，造福全體中國人民的果實。

3) 然而，上海教務會議並不僅僅是摒棄早先盛行的錯誤做法。這不是一個「改變策略」的問題，而是遵循最符合教會性質及使命的道路——只依靠基督本身的恩寵和祂的吸引力。第一屆中國教務會議的與會者們展望未來。他們的未來就是我們的當下。

在歷史的進程中，教會走過了、並正在走一條又一條不可預見的道路，也包括了忍耐和考驗的歲月。在中國，上主一路守護著天主子民的信德。無論是上海教務會議的前後，還是今天，天主子民的信德一直是指南針，為各個時期指引了道路。

與羅馬主教共融的中國天主教徒行進在當今時代。在他

們所處的生活環境中，也以慈悲善工和愛德見證自己的信仰，並藉著他們的見證，爲了和諧社會共處、建設共同家園作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在我們看到的非人性化勢力似乎要加速世界終結的時代，跟隨耶穌的人熱愛和平，並與所有致力於和平的人聯合在一起。

4) 上海教務會議的與會者們展望未來。會議閉幕幾天後，他們前往上海近郊的佘山聖母朝聖地朝聖。

如同上海教務會議的神長們那樣，我們也能展望未來。紀念上海教務會議，也能在今天啓發整個教會勇往直前的新路和坦途，從而在當下宣講及見證福音。

五月是天主子民敬禮童貞聖母瑪利亞的月份，正是在這幾天，我們的許多中國弟兄姐妹們前往佘山聖母朝聖地朝聖，將他們的祈禱和希望託付於耶穌的母親的轉禱。

再過幾天，5月24日進教之佑聖母瞻禮，依照本篤十六世教宗在致中國天主教徒信函中的要求，全世界的教會將與在中國教會的弟兄姐妹們一起祈禱。我也在精神上登上佘山，讓我們一起把在中國的主內弟兄姐妹們、全體中國人民，以及我們可憐的整個世界託付於進教之佑聖母瑪利亞，懇求她的轉禱，讓和平遍及各地。

進教之佑瑪利亞、佘山聖母，爲我等祈！

二、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服從教宗無損愛國

帕羅林樞機在上海教務會議百年紀念大會上，稱讚剛恒毅

總主教的重大貢獻，並借用他的話指出：「教宗是世界上所有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無論他屬於哪個國家。服從教宗不但無損愛自己的國家，而且能純正並激發它」。誠然，教宗與全世界天主教徒之間的合一，這種共融是信仰不受外部政治利益影響的最佳保障，也是牢牢扎根於當地文化和社會的最佳保障。帕羅林樞機的談話重點摘要整理如下：

1. 良好信徒和良好公民並不衝突，甚且相輔相成。
2. 上海教務會議對於今日的重要價值。首先，「那次的中國會議為許多其他傳教國家成為模範，這些國家以中國會議為榜樣，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為召開各自的全國會議作了準備」，它毫無疑問地在此展現了更廣泛的教會意義。其次，它對當今教會致力於「同道偕行」的反思，讓天主子民「成為教會生活有責任心和主角」，也作了美好的榜樣。
3. 從「外來傳教」到「傳教的教會」：剛恒毅總主教在本篤十五世《夫至大》宗座牧函的啟發下，塑造了自己的傳教和外交「策略」，決意召開一次在中國教會的教務會議。他將「外來傳教」的概念轉變為「傳教的教會」，其理念顯而易見。他為促進本地神職人員的發展，在 1926 年祝聖首批六位中國主教，並以同樣的目的在次年成立了主徒會。
4. 續簽協議和固定性臨在：剛恒毅總主教留下的遺產如今仍可看到，2018 年至今，透過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彼此間的關係也得到了加強。他並希望能在中國有一種「固定性的臨在」，加深彼此的接觸。

三、一個當地語系化的教會

上海教區主教沈斌在發言中保證，將「不斷把中國教會建設成一個合乎天主聖意，接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涵養，為當今中國社會喜悅的聖而公教會」。他提出天主教會在中國臨在的四點深思，其中第一點就是「教會在中國的發展必須忠於基督福音」，即忠於「大公信仰」。他表示，中國政府實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並沒有興趣去改變天主教信仰，只希望天主教的神長教友站在中國人民利益的立場上，擺脫外國勢力的控制。

沈斌主教也提到，歷史上「一些傳教士具有強烈的歐洲文化優越感」，他們「甚至抱著利用基督宗教改變中國社會文化的意圖」。這樣做，「必然遭到很多中國人的抵制以至於厭惡」，從而「妨礙了愛的福音在中國人民當中的更大傳播」。他表示，今天中國人民正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天主教會「必須與之相向而行，走一條與當今中國社會文化相適應的中國化道路」。他號召中國的神長教友「愛國愛教，把教會的發展與人民大眾的福祉緊密聯繫起來」。關於這一點，沈斌主教引用教宗方濟各的話，表示「做一個好基督徒不但與做一個好公民不相悖，而且是其中的應有之義」。

四、塔格萊樞機的總結發言

在結束上海教務會議召開百年紀念大會之際，其內容是如此豐富並充滿讓人驚喜的要點。它不能如同一份存檔而交給歷史，因為它所提出的問題、所涉及的議題和所建議的解決方案，

儘管時代變遷，依然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因此，對此次會議中討論的許多開放性主題，有必要進行對照及對話，即便在此大會中已湧現了多樣不同的前景。以下嘗試回顧許多方面中的一部分。那同道偕行的經驗，對在歷史進程中的當今和未來的教會及中國教會團體的使命，仍具有建議性。

1. 首屆中國教務會議象徵著實現及標誌我們當今教會富含「同道偕行的召喚」的完成。

在上海會議開幕的莊嚴遊行中，有 45 位頭戴主教冠的高級神職人員，其中包括 17 位法國人、10 位義大利人、5 位西班牙人、5 位比利時人、4 位荷蘭人、2 位德國人和 2 位中國人。還有奧斯定會士、耶穌會士、遣使會士、多明我會士，以及來自巴黎、米蘭、帕爾馬、愛爾蘭和美國的其他傳教會成員。宗座代表剛恒毅奉教宗庇護十一世之命主持會議，在其開幕致辭中，他引用了凱撒肋亞的優西比烏，將上海的會議比作尼西亞會議，在那裡「相隔甚遠的人，得以聚集一堂」。剛恒毅隨後表示，第一次中國主教會議標誌著「中國的重生時代」。強調之餘，在所謂的「傳教國家」中，從未有過這樣一場在文化、國籍、語言和教會背景上如此廣泛多樣的教會大會，卻是真的。

上海會議的與會者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的會議在某些方面是一種中國土地上的「提前的梵二大公會議」。在上海，同道偕行並非以次要的，而是以教會生活的一個建設性且不可捨棄的幅度被展現出來；甚且，在上海，同道偕行也不只體現為泛泛而談的勸勉或抽象的原則聲明，卻圍繞著具有真正利益的問

題，做出具體而共同的決定。剛恒毅在其講話和回憶錄中反覆提到，會議的目的是為中國教會提供一個「傳教法規」，無論是為當下還是未來，其核心是強烈呼籲定期在個別代牧區、在某區域和所有區域舉行主教會議和教務會議。

2. 第一次全國教務會議展示了教會的使命——如何保護和促進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尊嚴。

《夫至大》強調，基督信仰在本質上對任何民族和任何人類社會都不是「外來的」。同樣，上海會議堅定地重申，福音的喜訊由教會來見證，它應當在不強加自己的霸權和重要性下，在沒有政治、社會或文化壓力的情況下完成。教宗方濟各也在《福音的喜樂》116~117 條中重申，當一個團體接受救恩的宣告時，聖神就會以福音的變革力量使其文化豐饒。天主教並非具有獨一的文化模式，教會在其傳教工作中也吸收了每一種文化和每一個民族提出的積極價值，這些價值「豐富了福音的傳播、理解和生活方式」；畢竟「信仰不能被局限於某一種特定文化的理解和表達之中。單一文化不能窮盡基督救贖的奧秘」。

剛恒毅主教的傳教敏感度，已意識到「適應方法」的緊迫性。這種方法考慮到中國文化和政治現實，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深刻的變革階段，充滿了未知數，並且認識到有必要擺脫「西方主義」。然而，在此遠景和向普世性開放之際，我們對當今「本地化」或地方特性的呼籲，也可能演變為自我封閉、無力對話的內向，最終成為無益和不結果實的自戀退縮。每一種真正文化的身分實際上總是在行程中！

3. 福傳的果實：地方教會與羅馬主教和其他地方教會的共融。

無論是在上海會議期間，或今日推動傳教事業，都不是一種對歷史和傳教神學的審判。事實上，衆多傳教士的聖潔生活和無私奉獻的使徒工作，始終被視為福傳的基本要素。他們使命的完成，促成地方教會的誕生和成長，就如所有教會歷史中所發生的一樣。因此，建立一個中國的傳教教會，它是始終向普世教會和其他地方教會開放的。這種開放性在與羅馬主教，即與聖伯多祿繼任者的共融中，得以保存及保障。上海會議對儘快提升地方神職人員角色的迫切呼籲，以及不排除本土神父擔任任何負責人的角色，是希望傳教士播下的種子能夠由屬於中國人民的主教和神父結出果實，並使救恩的宣告能夠用「母語」傳給他們的人民與各團體。

4. 剛恒毅，追隨利瑪竇足跡的先知人物。

剛恒毅這位教會的僕人，將來自世界各地而聚集於上海教務會議中的主教傳教士們，視為一個標誌，以此表明全世界的教會都對在中國天主教教友身上所發生的事情感興趣，並充滿愛意地參與其中。相信他會很高興看到今天中國天主教團體，既完全是天主教的，又完全是中國的。與剛恒毅樞機保持一致，我們福音傳播部的每一位都非常關注所有關乎中國兄弟姐妹的一切，並感受到他們的事件對整個普世教會有著重要的展示和分享。可能會有問題、不理解和意外，但我們對中國天主教會的道路從不冷漠或無動於衷。感謝上主，即使在試探中，祂也守護並接納這個旅程。